

边缘的丰饶

——澳门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与特殊品格^①

◇ 张堂铸^②

摘要：澳门现代文学自1980年代开始自觉突破与起飞发展后，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从沙漠到绿洲，澳门现代文学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途，也走出了自身的格局。一如澳门的象征标志“莲花”般，在长期的异国文化与博彩文化环伺下，始终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澳门文学因此格外值得我们尊敬。

观察澳门文学的发展轨迹，笔者归纳出其特殊性有四：殖民/移民色彩、过客/边缘心态、小城/华人传统、商业/报刊性格。这四点决定了澳门文学自1980年代以来的审美风格、艺术倾向与文化品格，其特色与局限都受到了这些特殊性的制约与影响，并因此而和港、台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澳门文学；澳门现代文学；土生文学；博彩业；新移民

① 本文以“澳门现代文学”为题，主要是因为自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月中旬，汤显祖曾到澳门，写下《香澳逢贾胡》等若干首古典诗作以来，古典诗文一直是澳门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明清之际，或清末民初，澳门成为遗老、遗民作家避居之所，曾写下许多充满故国之思的悲痛之作。日寇侵华时，因澳门为非战区，众多中土文人投奔至澳门，也写下许多爱国色彩的古典诗文。可以说，直到20世纪20年代，澳门文坛基本上还是旧文学的一统天下。当新文学浪潮在包括香港和台湾都产生一定影响时，澳门却诞生了由冯印雪、冯秋雪兄弟等人创立的第一个旧体诗社“雪社”。据澳门前辈作家李成俊的回忆：“澳门早期新文学活动应该说是‘九一八’救亡运动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见李成俊：《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澳门文学论集》，东亚大学中文学会编，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年3月，第42页。）因此，所谓“澳门文学”，是涵盖了新旧文学的统称。但自80年代新文学发展成熟后，旧文学相对比较式微，所谓“澳门文学”在不特定指涉的情况下，一般多指新文学。本文以澳门现代文学为题，不讨论古典诗文，但在行文时则简为澳门文学。

② 张堂铸（1962—），台湾新竹人，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政治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台湾文学、现代散文。著有《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论》等书十余种，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传记丛书》等多种。

一、金光/莲花：近乎奇迹的澳门文学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当葡萄牙船队从“娘妈角”登陆澳门后，澳门的历史在被迫中揭开新页，一个巨大的改变就在那上岸的瞬间悄然成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一跃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通、贸易、宗教交流的枢纽，并随着时间的演进，其中介角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于是，我们看到“东方的梵蒂冈”，以及“东方的蒙地卡罗”，在此辉映并存，澳门从此成为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特殊人文景观的小城。葡国文化与中华文化在此和平共处、交会碰撞400余年，到处可见的欧式教堂与四处林立的赌场，尴尬讽刺地对峙着，凝塑出澳门社会文化极其特殊的形态。1999年结束殖民统治，正式“回归”祖国后，澳门社会进入了“新时期”，从文化、政治、经济到教育、语言、文学等各方面，产生了迥异以往的质变。随着葡萄牙人的陆续离去，澳门长期受到殖民主义影响的痕迹将逐步消除，西方宗教色彩虽然存在，但与昔日相比，不免有些式微之势；然而，2002年赌权的开放，除了刺激既有的娱乐场“推陈出新”外，由欧美跨国财团投资带动的博彩业，以大气魄、大手笔的眼光和资金，铺陈出一条更加璀璨夺目的“金光大道”，就如美国在内华达州沙漠上建起海市蜃楼般的拉斯维加斯赌城，澳门也在“文化沙漠”上堆积起一座金碧辉煌、豪华不夜的娱乐赌城。从民族主义的殖民到资本主义的殖民，澳门这座小城又再次面临巨大的冲击。

澳门真是一座小城，香港人甚至视之为“澳门街”。城市面积是由澳门半岛以及两个离岛组成，总面积原本只有23.6平方公里，但近几年来大肆填海，增加了5.6平方公里，总面积增加至29.2平方公里。在这弹丸之地的蕞尔小岛上，竟然林立着至少30家大型的“娱乐场”，从葡京、皇家到星际，从金沙、威尼斯人到新濠天地，一条金光大道已然成形，大道上的光芒也正在映射、撞击、改变着澳门社会、文化与澳门人的生活与心理。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不到30平方公里的半岛上，据说每平方公里有二至三名诗人；澳门人口40余万，据说每一万人中就有一个诗人。^①

^① 见饶芃子：《从澳门文化看澳门文学——在“千禧澳门文学研讨会”上的讲演》，《千禧澳门文学研讨集》（廖子馨编，澳门日报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0页。

澳门因此被称为“诗乡”、“诗岛”、“诗城”。然而，诗人还是寂寞的，和五光十色的娱乐事业相比，文学边缘、弱勢、冷清的地位，使作家们坚持的姿态总带有一些悲剧英雄的色彩。就在填海的土地上，兴建了国际机场，带来无数人潮；也在填海的土地上，铺就这条金光大道，带来无数钱潮。人潮与钱潮，热闹繁华的背后，澳门社会面临的是危机还是契机？在金光四射的消费娱乐环境中，澳门这座小城的象征标志——莲花，其存在与绽放能否“出淤泥而不染”？澳门的诗歌，澳门的文学在这样的土壤中生根、发展，能否给人美好的“莲的联想”呢？莲花不管是开在“文化沙漠”抑或“金光大道”上，都是一种艰难得近乎奇迹的现象。正是这样的现实环境、生活形态与文化氛围，澳门文学的莲花品格，因而特别值得人们尊敬，同时也特别需要人们的理解与关注。

二、觉醒 / 回归：澳门文学两次重大转折

澳门文学自 1980 年代中期开始自觉突破与起飞发展后，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从沙漠到绿洲，澳门文学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途，也走出了自身的格局。回顾澳门文学的发展，历经了两次较大的转折：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觉醒”与“崛起”；二是新世纪的“回归”与“重建”。假如 1980 年代是走向文化自觉，与世界接轨对话，那么，新世纪则是走入文学自身，重建精神家园。两次的转折都有一个共通性：走进澳门，发现澳门。

澳门文学每次重大的突破或改变，都与中国内地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大陆 1970 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对澳门经济与社会有着直接而全面的影响。1980 年代的澳门，新的商业消费体系逐渐成形，新的文化思潮开始激荡，新移民作家、诗人的加入，对澳门文学产生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波，促使澳门文学历经一次蜕变而焕然一新，缔造了风起云涌的新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活动、刊物、社团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姿，至 1990 年代中期为止，其所展露、积累的成果是傲人的。尤其重要的是，在觉醒的变革中，澳门文学终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形象，从过去附属于中国内地文学和香港文学的边缘地位与模糊印象，一跃为清晰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生力军，在世界华文文学广阔版图中，以自身独立的面貌置

入了一块耀眼的拼图。

1980年代，在澳门作家心目中肯定是一段值得缅怀与追忆的黄金时代：1983年，澳门第一个纯文学副刊《澳门日报·镜海》诞生；1984年，在“港澳作家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主张；1985年，一套五本的“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出版，这是澳门出版的第一套文学创作丛书；1986年，第一次以澳门文学为主题的“澳门文学座谈会”召开；1987年，最大的澳门现代文学团体“澳门笔会”成立，并在1989年创办第一本大型纯文学刊物《澳门笔汇》；1989年，最大的诗人社团“五月诗社”成立，并在1990年出版代表性刊物《澳门现代诗刊》。短短几年，澳门文学仿佛脱胎换骨，令人刮目相看，就如澳门学者庄文永所指出的：“80年代的澳门文学是一个鼎盛时期，无论是作家、诗人队伍的壮大，还是文学作品的丰富性，都是澳门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澳门文学因此揭开了新的一页。”^{[1] (P494)} 作家廖子馨也认为：“80年代可誉为澳门文学的春天。”^{[2] (P185)}

这个振翅起飞的势头锐不可当，一直延续到90年代：1992年，“澳门写作学会”成立并出版《澳门写作学刊》；1995年，两年一届的“澳门文学奖”首度举办，至今已至第八届；澳门大学师生合办的文学刊物《蜉蝣体》也是1995年面世；1997年底，澳门大学中文学院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再加上一系列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的结集出版，文学批评、史料专著的问世，澳门文学的格局扩大了，澳门文坛热闹起来了，澳门作家的活力与创意在1980至19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显得特别活跃而充沛。

假如澳门文学是一条平静缓流的江河，那么1980年代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阵浪潮、一段风景。这股浪潮在回归前夕达到顶点，仿佛是满载而归的渔船，在上岸后将渔货倾泻而出，一一盘点，于是，我们看到了1998年由刘登翰主编出版的《澳门文学概观》，全面介绍了澳门文学的历史、现象与成就，同年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澳门现代文学作品选》，列入“九九澳门回家书系”套书中；1999年11月，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四册的《澳门文学袖珍丛书》，同时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印行了一套二十册《澳门文学丛书》，加上12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发行一套五本的《澳

门人文丛书》^①一时间，“回归热”带动了“澳门热”，“政治热”带动了“文学热”，这些多少带着“政策性动机”的出版热潮，除了作为庆祝回归的贺礼之外，也集中呈现了澳门文学创作的整体成就与丰富面貌，诚如陶里为“澳门自有文学以来最有规划最大部头的制作”的《澳门文学丛书》所写的序文所言：“由于回归效应所及，澳门文学这几年受到内地有关部门的关注，十分明显，有发表专著论文的，有院校增设课程的，有出版澳门作品的，盛极一时……在澳门回归祖国前夕，……出版《澳门文学丛书》，比较完整地把澳门文学的形象带进了祖国，这应该是澳门文学的盛事，也是中华民族在文学这个整体上的一大喜讯。”^{[3] (P1), (P12)}

然而，一阵繁弦急管的绚烂过后，澳门文坛很快又“回归”到之前的平静，澳门文学的爆发力如璀璨烟花，有种无以为继的消退现象。或许是曾经渴望、追求的目标都已落实，如文学刊物的创办、文学奖的设立、文学社团的成立、文学作品的出版等，这些文学繁荣发展的形式要件都已具备，反而失去了原先的冲劲与斗志。也或许是澳门的客观环境改变，文学不得不停下脚步来沉潜、摸索对应之策，这客观环境的改变包括回归后与中国内地文化的加快融合，大量新移民的再度涌入，以及赌权开放后，整体社会弥漫着普遍的消费娱乐倾向，这是对澳门文学第二次的冲击波。其中又以博彩业一枝独秀所带来的畸形经济与功利心理，对澳门文学产生了严峻的考验，能否在这次的冲击下有新的超越与突破，是所有关心澳门文学发展的人担忧与思索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或许是澳门作家开始向内转，重新思索文学自身审美的突破，试图构筑更为深化的艺术新境，让澳门文学的本土性、主体性、独特性有更深刻、清晰、丰饶的表现，而目前正处于破蛹而出前的蓄势待发而已。

世纪之交，澳门文学已经完成了自身命名与定位的文学使命；回归十年，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结束，新的社会文化正在缓步转型，今

^①《澳门现代文学作品选》由陶里、林中英、郑炜明主编，内分短篇小说卷、散文卷和诗歌卷；《澳门文学袖珍丛书》为四位作家的散文集，分别是陶里《等你在冬季》、林中英《相思子》、凌钝《你一定要来澳门》、林玉凤《咖啡档》。《澳门文学丛书》由澳门基金会、澳门教科文中心策划，陶里、白舒荣主编，分为小说卷5本、诗词卷6本、散文卷5本、评论卷3本、青年文学卷1本。《澳门人文丛书》由李鹏翥、杨匡汉主编，分别为李鹏翥《澳门古今》、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黄晓峰《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陶里等《水湄文语》、刘原《澳门写真》。

日的澳门文学，应该也站在了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上。出走与回归，中心与边缘，自觉与自省，本土与世界，都是澳门作家不能回避的世纪课题。从起步到起飞，再从缤纷到平静，澳门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迥异的视阈，独特的典型，参照的镜像。总结并梳理澳门文学在三十年历史汇流中所迸发交错的种种面貌，对澳门文学自身的茁壮、中国文学的健全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的丰美，都是一种必要，这种必要，既来自于历史的使命，文化的反思，同时更来自于审美精神的召唤。

三、特色 / 制约：澳门文学的特殊性

1984年3月，在澳门长大、在香港以诗成名的作家韩牧，于《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激起了澳门文学界的自觉意识，可以视为澳门文学觉醒的标志性宣言。在会中韩牧提到：“在发展方面，我认为澳门是大有前途的。不要认为地方小、人少，重要的是它有没有特色。”^①形象的建立，最重要的是寻找并表现出“特色”来，在这方面，澳门其实是“得天独厚”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暂且不谈，澳门自葡人入踞、开埠400多年来，为澳门社会、文化带来了许多具有“特色”的影响（暂且不论好坏），不同于大陆与台湾，也异于香港的自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长达四个世纪的葡人统治，使澳门有了自身独特的地位、面貌。可以说，澳门的“特殊性”，几乎都在葡人殖民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形成。

观察自1980年代以来澳门文学的发展轨迹，其特殊性至少有以下四点：殖民 / 移民色彩、过客 / 边缘心态、小城 / 华人传统、商业 / 报刊性格。这四点长期历史嬗变、文化积累的结果，决定了澳门文学自1980年代以来的审美风格、艺术倾向与文化品格，可以说，澳门文学的特色与局限都受到了这些特殊性的制约与影响。

（一）殖民 / 移民色彩

16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对澳门400多年的实质管治，使葡国文化

^① 韩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发表于1984年4月12日《澳门日报·镜海版》，后收入韩牧：《韩牧评论选》（香港：红出版社，2006年）。引自东亚大学（即今澳门大学的前身）中文学会编：《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年3月），第195页。

对澳门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日常饮食、习俗、语言到宗教、建筑，都可看到与中华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形态。步行在澳门街头，随处可见西方的天主教堂、葡人居住的欧式房舍、葡国餐厅、教会学校，使澳门宛如里斯本的缩影。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原圣保禄教堂的正面前壁），纪念16世纪葡国重要诗人贾梅士的白鸽巢公园，还有议事亭前地一带铺设黑白色碎石地面，并砌成波浪形图案，也是典型的南欧风味，甚至于风行一时的葡式蛋挞，或是处处可见诸如“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贾伯乐提督街”、“约翰四世大马路”等街道名称，无不充满着以葡国为主的欧陆特色，殖民的痕迹在澳门可说是深深烙下。

殖民的文化记忆与历史遗迹，在澳门文学作品中经常可见，特别是散文，作为特殊的题材或背景，使这些散文散发出独特的澳门风情，如凌棱《走过大三巴牌坊》，描写她在殖民象征大三巴牌坊下，“天天从这些石阶上落多次的岁月”；徐敏的《镜海情怀》多以澳门小城的变化与发展为题材，如《我爱这小城》、《黑沙怀古》等，地方色彩浓厚，偶有殖民历史沧桑的感慨与思考；黄坤尧的《解读牌坊》则是考证介绍牌坊壁画充满象征意蕴的神学内容；凌钝《镜海常虹两青天》提到贾梅士、利玛窦等人与澳门的因缘纠葛，也对澳门殖民历史有深切的体认：

澳门是个极富风情的小城，大街小巷，晨光夕照，无不令人依恋。澳门又是个巨大的历史回音壁，只要踱足走过普济禅院、荷兰园，或者孙中山纪念馆，都可以听见列强的炮声，民族的悲歌，志士的呼唤，相互激荡，经久不息。澳门的风景中西并存，历史也华洋夹缠，血泪难分。……近年来西方文化面临全面反思的考验，殖民主义的课题更是热门。与碧发金眼的同学讨论欧洲史诗与殖民心态，总觉得他们诚恐有余，历史感不足。……没有切肤之痛，毕竟难以体会历史之悲凉与慷慨。……在课堂上想起高祖父当年经澳门被卖猪仔至秘鲁的家史，更是百感交集。^①

^① 凌棱：《走过大三巴牌坊》，《有情天地》（澳门：星光出版社，1991年8月）；徐敏：《镜海情怀》（澳门：星光出版社，1990年11月）；黄坤尧：《解读牌坊》，《翠微回望》（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年11月）；凌钝：《镜海常虹两青天》，《一壶浊酒喜相逢》（澳门：星光出版社，1993年8月），第147-148页。

只有切身体验过殖民种种，才会“百感交集”，也才会有“切肤之痛”。殖民，成为许多澳门人心中的隐痛，也是澳门文学的大背景、大主题。

也许是历史训练使然，吴志良的随笔文章总能以文化的视野追溯历史，思索并展开他对澳门深刻的观察，他的散文集《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中多篇都触及到了殖民历史的反思，如《澳门的历史与记忆》、《香山濠镜辨光芒》、《小城故事》、《庐山真面目》等，但也正如书名所强调的，抛开殖民悲情与历史屈辱，才是澳门真正的城市精神与“向前走”的动力，他说：“在反思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时候，在吸取惨痛历史教训的同时，我们更加应该保持平常心态，走出历史的悲情，理性认识到澳门的积极意义”，那就是澳门曾经“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相互认识、沟通、理解、尊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因此，“游客来到澳门，感受到的是朴实无华的人性化、生活化的气质，而不是现代城市的嚣嚷烦躁。正是在平凡中，澳门给人不平凡的感觉”。^[4] (P6-7) 吴志良的文章善于说理，加上对澳门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入的研究，是澳门说理散文中的一枝健笔。

从小渔村到现代都会，四个多世纪以来，（澳门人口主要是由移民组成，有来自欧、亚其他国家，特别是葡国的人，但主要仍是华人）以2003年的统计数字来看，在澳门总人口中，华人占96%以上，葡萄牙及土生葡人占2.5%，这样的人口比例基本上从以前至今没有太大变动过。^①根据《澳门纵谈》一书的分析，华人主要有三类：居澳两代以上的华人、世界各地的归侨、1979年以后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第一类约占总人口7%，第二类约占10%，最后一类则占人口的最大比例，语言与地缘关系，又以广东人为大宗，但上海人、福建人也有一定比例。^②可以说，澳门基本上是个移民社会，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交融，自然会给文学作品带来多文化、跨文化色彩。

移民是个世界性的话题，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身或放逐、或流浪、或融合、或重生的集体记忆，历史与地理的因素使然，移民书写成为澳门文学的重要母题，不论是刻画适应与奋斗的生存现实，非法偷渡

① 参见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修订版（澳门基金会出版，2005年4月），第13页。

② 引自孙静：《漫谈澳门文学的特色问题》，《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第574—575页。

的身份焦虑，还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经历，题材丰富且表现深刻，和香港一样，这类作品是澳门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廖子馨获得第二届澳门文学奖小说组首奖的《命运——澳门故事》，就是一篇移民题材作品，写内地大专女生沈巧放弃所爱的故乡男友，在1989年与其他20多位劳工一起从关闸到澳门来工作，最终获得澳门身份证的故事。当1995年中秋节前一天，澳督证实将为三万多名持临逗证者发给澳门身份证时，沈巧也首肯了在澳门相恋的阿伟的求婚。故事没有太大的高潮起伏，但有现实的说服力，是富时代感的典型澳门故事；又如余润林的《澳门九景》，具有浓厚的澳门色彩，情节描写“我”和阿蝉、阿珍从内地偷渡到澳门，历经无证的提心吊胆，取得正式身份的沉重代价，终于在几十年艰辛拼搏后，有了和乐的家庭和安定的生活。篇名为《澳门九景》，指闻名的澳门八景之外，多了主人公奋斗有成的一景，在送孩子出国留学后，“我”感慨地说：“只因为澳门的宽容，像我这样的丑老头，没有被赶尽杀绝，也确是一景。但是这个景也将快换了，澳门将有新一代。”^①其他如林中英的《重生》、陶里的《夜尽时分》、郑重的《钓鱼》、劲夫的《黄昏变奏曲》、冯锯鹏的《过埠新娘》等，也都反映了新移民的血泪心声，特别是从大陆移民来的底层劳工，他们的经历与心态，构成了澳门移民书写的精神内涵。

殖民与移民，都给人漂浮、流动、无根之感，黄文辉所发出的感叹：“我的叔公当年是马来西亚的新移民，我当年是澳门的新移民，那么，我的下一辈呢？”^{[5] (P10)}语气中满是无奈的茫然。诗人懿灵更以“流动岛”的形象概括澳门人驿动的心与不安的命运：“牌坊顶上的游人跟/牌坊底下的路人的关系/就只是无言的猎影/心是菲林/镜头是眼睛/而焦距是无声的叛逆。”游人与路人，都只是路过，短暂的驻足之后仍然是离去，诗人因此而感到澳门命运的悲剧性：“举头只见/无巢的梁上/燕子掠过/流动的水和岛上/无数慌张的眼神/描绘着海浪的泪痕”。无巢即无家，流动的岛上，慌张的人们，懿灵混杂着殖民与移民的失落感，在《异乡客》中也有讽喻深刻的呈现：“打从人们给我一个/‘有证劳工无证家属’的名衔时/阳光只是悬在窗棂上的一块碎片/等待点算等待风干/等待和时间一同归去/从此，从此微黄的皮肤就如微黄的信纸/

^① 余润林：《澳门九景》，《澳门笔汇》第10期，1996年9月，第42页。本篇获首届澳门文学奖小说组第二名。

写上岁月的烙印 / 却不曾说起那个离家以后的故事 / 就让乡间的流传成为永世的流传 / 如同我的身躯永远地成为大海的谜……”^①诗中流露出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渴望。新移民流离的情绪,“离家以后的故事”,已经成为观察澳门文学一个特殊且不可忽视的切入点。

(二) 过客 / 边缘心态

不论是 1556 年葡国诗人贾梅士的来到澳门, 还是 1591 年中国戏剧家汤显祖的途经澳门, 澳门自有文学以来, 都是外地过客留下的雪泥鸿爪, 世居澳门本地者的作品并不多见。自晚明到民初, 澳门文学的创作者主要是避难的前朝遗民、宦游澳门的官员、各地来此游历的文人以及皈依基督后来澳门学道的内地信徒, 他们使用传统的诗文形式, 写景述怀, 忧国怀乡, 留下许多以澳门为背景的作品。他们停留时间长短不一, 但“过客”心态都很明显, 可以说在 1930 年代以前, 澳门始终缺乏本土性、草根性的创作, 这使得澳门文学缺乏在地性的凝聚力, 较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难以积累, 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牵制。刘登翰因此推论道: “文学在澳门的出现, 主要是一种‘植入’, 而非‘根生’。特别在新文学出现之前, 尤为明显。”^{[6] (P24)} 无根的文学, 开花结果只能是一种奢望。

当五四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际, 澳门文坛仿佛与世隔绝般几乎毫无呼应, 甚至于在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初期, 澳门文坛的古体诗词创作竟达到了一个全盛时期。随着 1930 年代抗日情势的发展, 许多读书会、剧社等爱国团体来澳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 内地及香港的一些文人陆续来澳门避难或工作, 才使澳门文坛活络起来, 并使澳门的新文学有了初步的觉醒。战后有一批内地作家如茅盾、张天翼、端木蕻良、夏衍、秦牧、紫风、杜埃等曾先后来澳门, 带来一些新文学的气息, 但随着他们的离去, 澳门文坛又重归沉寂。这些过客文人虽能带动一时文化盛况, 但都如浮萍般飘荡而去, 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即使是 1970 年代, 过客心态依然存在, 如原为印度尼西亚归侨的女作家玉文 (原名吴珍妮), 在迁居澳门后仍对澳门社会有一种疏离感, 在《澳门日报》副刊《新园地》和其他六位女作家合写《七星篇》专栏, 结束之际, 她写了《作别》一文提到: “作别书有七颗星星的专栏, 就让我拥有过客的回忆吧……”显然带着浓厚的过客情结。过客心态的挥之不去, 本土意识

^① 懿灵的两首诗:《流动岛》、《异乡客》, 见《流动岛——懿灵诗集》(香港: 诗坊出版, 1990 年 3 月), 第 35、54 页。

的薄弱，使得澳门文学在发展上，“常常呈现出偶然性、阶段性和间歇性的特点，甚至出现停顿和断层。”^{[6] (P24)}

澳门地处边陲，颇有“小国寡民”之风，自晚明以来，特殊的地位使它远离中国政局的纷扰，海角一隅如武陵桃源的边缘位置，屡屡成为中土文人临时的避难所。葡萄牙将澳门视为进入中国传教与经商的跳板，长期以来并不重视澳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加上葡萄牙海上霸权时代的结束，澳门曾经扮演的中西交流角色逐渐被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取代，现代经济发展积弱不振，导致澳门重要性日益下滑。1920年代以后，内地文人多半选择香港为栖居之地，澳门被边缘化的情况十分明显。滞后的文化氛围与文学环境，使得一些澳门的文学青年移居香港或海外，如张错、韩牧、谢雨凝、梁荔玲、杜临风等；又因投稿园地不足，许多澳门作家遂将稿件寄往香港报刊发表，形成澳门文坛一个特殊的“离岸文学”现象，学者凌钝搜集汇编出版了两册《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收录了1950至1980年代中期先后在香港发表作品的澳门作者近40人，如陶里、李心言、汪浩瀚、江思扬、剑滢等。^①林中英因此感叹道：“澳门社会的微型格局，特别在身旁那个大香港的阴影之下，澳门人的确普遍大气不起来。”^{[7] (P197)}过去习称“台港文学”或“两岸三地”，澳门都成为尴尬的被遗忘者。长期以来的见“港”不见“澳”，使澳门文学摆脱不去依附、隐形、边缘的角色。

这种特殊现象，其实是澳门文学独立性、自觉性不足的结果。地理/心理上的边缘性，形成“走出澳门”的倾向，向外看的结果，是草根性、本体性的丧失。懿灵的感叹在澳门作家中绝对不是特例，她说：“澳门人是流离的，这里多的是过客；澳门政治是流离的，一时偏右一时又偏左；而整个岛是流动的，流动的岛不但向外流，还有以内圆心为目标的不不断向内倒流的特性。而我只是内外圆间的边缘人。”^{[8] (P110)}流离与边缘，成了澳门文学具象征性的隐喻特质。文学在澳门长期未受到重视，在重政经、轻文化的大气候中，文学这个小气候一直很难成为气候，文学边缘化的结果，使澳门至今仍无法培养起职业作家，所有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业余的，这和出版机制单薄、发表园地有限、阅读人口不足有关，但也不能忽略文学在澳门社会被边缘化的因素。这种清冷的局面，要到

^① 凌钝编：《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基金会出版，1995年5月），分新诗、诗评、散文、小说四辑。

1980年代文化觉醒之后，家园意识得以复苏，文学的“软实力”有了相对稍微宽阔的伸展舞台后，才有了令人不甚满意的改善。虽然澳门文学的边缘地位没有太大的改变，但至少澳门作家的主体性格已经充分建构，这就使得澳门文学走出自身困境，走向远大格局，开始成为一种可能。

（三）小城/华人传统

澳门是一座充满人情味、和谐感的小城，完全像邓丽君《小城故事》歌曲中的“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社会没有太大的激情冲突，没有严重的族群对立，即使它是一个多移民、多族群、且历经殖民统治的地方，但它却在一种宽容平和、融洽保守的气氛中，型塑出属于小城特有的田园牧歌情调，影响所及，澳门文坛很少稍具规模的论战，连不同意见的笔战也都是和风细雨，点到为止。“澳门的作家总是用平实的文笔来寄望美好的人生”，^{[9] (P120)}评论者廖子馨这样总结澳门文学的创作风格与主题倾向，至于原因则是：“澳门这个独特地区充满温情意识，历史文化承受儒家‘仁爱’、‘宽恕’精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纯朴、真挚，这种文化氛围，令文学创作充满温情色彩。”^{[9] (P28)}

澳门深浅不一的人情网络，就如澳门大小数不清的横街窄巷，传统华人社会重伦理、讲礼节、多人情的美德，在异国殖民的澳门社会反而被保留得十分彻底。林中英在散文《多情城市》中写道：“澳门的四十多万人口，挤在除两个离岛外的六点五平方公里小半岛上生活，地狭人多，形成一种密切的人际关系，亲戚脚步勤，你来我往；气味相投者亦容易呼朋引类；朝见口晚碰面，不熟悉的亦可作点头之交。走在澳门街上的本地人，似乎人人都是交际家，可以一路上招呼不断，点头不绝……地小人情厚，澳门盛产人情，原因是这样吧。”^{[10] (P121)}这是澳门社会的长处也是欠缺，林中英就认为：“它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但欠缺碰撞、抗争之下的改革、更新的动力，致令社会欠缺活力，呈现的是保守形态的现代都市化的社会。”^{[11] (P55)}确实是一语中的。

对于澳门社会与文坛如沐春风、闲适舒缓的特性，新生代作家有较强的自省与批判意识，林玉凤说得直接：

记得以往常常向外地的朋友介绍澳门的优点，最令自己谈得起劲的，就是这里的小镇风情。那时，在我的理解中，“小镇风情”除了指小城的自然风光和人物气质外，还象征着人与人之间没有甚么芥蒂，而且很多时会有一种自然而然

的独特感情，没有人喜欢勾心斗角，也没有什么事值得去勾心斗角，人人都在一种身心自由和谐的气氛、环境下生活。只是，在自己越欣赏这种情调的同时，也越发现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人在这里，很容易被“和平气氛”陶醉，以为自己真的是身处桃源。世界里就只有“交情”这一东西，而且还渐渐演变成一件工具，一种和“协商解决”无比匹配的工具。^{[12] (P3)}

黄文辉也有同样的感受，虽然写得有些“暧昧”：“澳门街和我都是暧昧的，因为我们都不敢面对自己生活中的现实，都不敢说出自己生活中的真实；我们都愿意在一种心照口不宣的暧昧中自欺欺人。……所谓悠闲融洽，只不过是暧昧的沉默而已。”^{[5] (P219)} 吴志良对澳门这种特殊性的形成则有一番切中肯綮的剖析，他认为澳门由于少受战火的波及，社会生活具有相对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传统中华文化的价值、规范，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加上小城市的社会结构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居民对环境的熟悉度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信任感也很高，如此一来，整个社会“没有你死我活的争夺，仇恨为仁爱所融化，没有非黑即白的对立，二元为多元所取代，没有茶杯里的风波，争议被理解所消弭。澳门虽小，胸襟很宽；人口不多，但信任合作，从而形成澳门的文化传统”。对这个小城特有的文化传统，他持正面的评价：“对当今因经济利益或宗教信仰而充满冲突和不安的世界，却是宝贵而珍稀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4] (P73)}

这种委婉敦厚、温情脉脉的文学语境，和中华文化长期作为澳门文化主体的作用有关。由于人口结构的悬殊，加上葡国殖民统治并未如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或南美洲的文化压制和激烈冲突，中华文化一直是澳门人生存和精神方式的依归，使得澳门能拥有自身不变的文化传统：兼容并蓄、尊重多元、重视伦理、关注教化。表现在文学上，是鼓励多过批评，包容多过攻讦，强调真善美的传统伦理道德，遂成为澳门文学的基本特征。《澳门笔汇》于1989年6月创刊号的发刊词是此一文学理念的具体宣言：

我们认为文艺并不从属于政治，但文艺如果离开了伦理和教化，那就失去其价值和作用。我们主张创作自由，文艺

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关键是内容要导人向上向善。

强调伦理教化，是中国“文以载道”文艺观的传统，澳门作家在精神世界、心理结构上受其化育并以此作为创作的主流意识。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的鲁茂，以“劝人为善”为写作宗旨，文章中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明显的职业特点，散文集《望洋小品》、《晨窗小品》、《笔耕集》中的文章就多是寓教于文之作；他的小说被视为“教化关注的典型”，代表作《白狼》写误信“江湖道义”的青年“白狼”误入歧途的曲折故事，主旨在揭露黑社会的危害，告诫青少年应悬崖勒马、改过向善；《凌晨》借一位初三女生岑爱明过分沉溺于追逐偶像歌星凌晨，在参加演唱会索取签名时因过于激动导致扭断了腿，“当然，凌晨不知道，也没关心，他的歌迷会也没有什么表示”。然而，岑爱明的父母、老师、同学，特别是好友莫燕娜，都对她表现出真挚的关怀和具体的帮助，小说结尾，岑爱明终于“领悟到一些道理了”，于是黎明上学途中，她“感动地望望晨曦初露的天空”，对莫燕娜说：“这才是最美好的凌晨啊！”又如《似花非花》中的妻子，面对丈夫的外遇，在一场慈善晚会演出上，以跳芭蕾舞天鹅湖的魅力，重新赢回丈夫的心。鲁茂至少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以他的文笔对广大的读者进行着如同课堂上的教育，“善”因此成为他作品的标志与特色。还有徐敏的散文集《镜海情怀》，内容多从日常生活取材，有花草树木的写真，也有人生哲理的抒发，整本书洋溢的是一种主观的人生向上的美好氛围，廖子馨就曾分析说：“徐敏无论写什么，写花写草、写人写动物、写咖啡茶情、写科学常识写思想，他都在这些事物中赋予善的意向，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体裁。”^{[9] (P105)}

男作家如此，女作家也不例外。澳门女作家在创作上多采取适合女性心理、角色、感受的叙述方式，表现主观抒情，娓娓道出自身生活天地的感悟，流露出强烈的传统女性特点。林蕙、林中英、沈尚青等几位主要的中年女作家，写作题材多半围绕着家庭、爱情、婚姻打转，温柔的女性眼光，使散文研究者范培松说她们是“以本色感人”。^{[13] (P125)}以林中英为例，李鹏翥为其散文集《人生大笑能几回》写的序言是《脉脉含情妙手传》，指出其作品“有高尚善良的情操，有参透人生的哲理，有热爱乡邦风俗的感情，尤其是洋溢着豁达宽容的态度”。^{[14] (P46)}饶芃子为其散文集《眼色朦胧》写的序也揭示其作品“没有泼墨式的激越和载不动

的愁情，多数是从世事、家事、友谊和自己日常接触到的各种人物，生发出对人生的思索和情怀”。^[15] 例如《交江湖朋友，做女人文章》一文，就充分流露出林中英甘于做小女人的传统心态，文中写道，因见书法名家赠给朋友的对联“交天下朋友，做江湖文章”，心喜而求字，“不过，联语中的豪迈之气，于我有所不配，遂小作更易，改成为‘交江湖朋友，做女人文章’。”这一改，她觉得“心里踏实多了”，而在文末有一番自白：“当今散文中‘小女人文章’之说，谓在文章弄尽繁琐碎屑的小趣味小感兴。文章之事，任人评说，小女人便小女人罢，反正它算别开生面，自有读者层面。标榜女人文章，既肯定自身，亦好让男性们去夺取这个‘天下’”。^{[16] (P67)} 看来，林中英对于传统华人女性的特质不仅甘于接受，且乐在其中了。

澳门文坛的小城特色、华人传统，最具体的表现自然是在文学批评上。李观鼎是澳门少数专业的文学批评学者之一，他在归纳澳门现代文学批评的特性时特别提到“温和性”，指出澳门文学批评是一种“说好话”的批评，“作家作品的优点和特点，要尽量说全、说够，而缺憾与不足，则尽量不说或少说”，李观鼎一针见血地说：“一味地兼容，虽然包含着对创作个别性的尊重，但同时也消解着批评的权威性地位；过多的首肯，尽管维系了与文学的和平共处，但同时却丧失了批评的自信力。惟其如此，澳门文坛迄今未曾出现真正的论争。”^{[17] (P4)} 这种温和性、捧场式的批评，一个推崇宽容、“相安无事”的文坛，只能说是在有着千丝万缕人情关系的澳门小城，以及传统伦理文化影响下的“特色”。

（四）商业／报刊性格

澳门文学的起飞是和澳门社会经济的起飞同步发生的。商业消费体系的日渐活络，对文学、文化、艺术的活络产生了客观条件上的促进作用。文学书籍的出版、文学活动的举办、社团的持续运作、阅读人口的培养等，都有赖于经济条件的配合。澳门文学不管是1960、1970年代的惨淡经营，还是1980年代的大放异彩，作为澳门最具代表性的报刊《澳门日报》可以说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凡在澳门有一点名气的作家，没有不和这家发行超过半世纪的报社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先在《澳门日报》副刊上写专栏，累积一定字数后由《澳门日报》出版社出书，几乎成了澳门作家走上文坛的模式。黄文辉甚至说：“澳门文学就是副刊文学”，因为“目前被称为文学作品的澳门作家作品集，大部分其实是报纸副刊作品结集而成，特别是散文，恕我孤陋寡闻，还数不出有哪一本澳

门作家的散文集不属此类”。^{[18] (P51)} 澳门文学确实是以报纸副刊为主要园地发展起来的，不夸张地说，没有《澳门日报》副刊，就没有澳门文学今日的繁荣。这和其他华人地区众多传媒竞争发展的形态有很大不同，《澳门日报》的一枝独秀成了小城文学环境的一个特殊表征。

当然，澳门还有其他文学性副刊，例如1937年创办的《华侨报》，创刊时有副刊《侨声》，后来逐步发展为《华座》、《华林》、《华青》等性质不同的副刊，1985年转型推出文化副刊《斑斓》，1994年再推出专栏文学副刊《周末派对》；又如《市民日报》也于1994年开设综合性文学副刊《东望洋》。然而，这些副刊的发行量、重要性、影响力都不如1958年创办的《澳门日报》上的《新园地》副刊，以及后来在《新园地》基础上改版的《镜海》文艺周刊。《镜海》版的创刊，是澳门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负责主编的廖子馨曾为文追述创刊初期的情况：“早期的作者队伍以澳门东亚大学（今澳门大学前身）师生为主，其中有澳门的、香港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仅仅两年时间，该校中文学会五位作者结集出版五本《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其中大量作品便是刊于《镜海》的。这仿佛给澳门文学打了一剂强心针。”^{[2] (P186)} 踏入1990年代，《镜海》陆续开辟了“镜海文谭”、“新苗”、“澳门作家访问录”、“澳门新生代写作人大展”等专栏，为澳门文学的成长提供多元养分。2000年主办“千禧澳门文学研讨会”，更发挥了《澳门日报》副刊作为华文文学交流平台的重要功能。至于《澳门日报》出版社，则是当前澳门文学能量最集中展现的媒介。1980年代中期由《澳门日报》成立星光出版社、《澳门日报》出版社之际，澳门的文学书籍是零出版。从1988年5月出版第一本著作《澳门文学论集》，至2008年4月出版《澳门文物建筑笔记》止，出版的数量已经突破一百种，为澳门文化、文学累积了丰硕的资产。澳门是否有文学，这些作品是最有力的证明。

澳门文学副刊的主导性，源自于文学期刊杂志的疲弱不振，林玉凤分析道：“目前仍在出版的社团文学期刊和杂志，基本上都是季刊和半年刊，又因为社团的人力和资源有限，期刊脱期的情况时有出现。相反，报章上的综合性副刊一般都是日刊，而文学副刊则以周刊为主，论时效，报章的副刊仍有相当吸引力，所以不少本地作者依然乐意将自己的创作投到报章去发表。”^{[19] (P549)} 目前为数不多的文学杂志中，以澳门笔会的机关刊物《澳门笔汇》最具规模，至今已出刊三十多期，不论专题设计、作家邀稿、作品选用，都有一定的企划性与主动性，但可惜仍是由几位

年轻作家业余兼差编辑，无法全心投入，以致偶有脱期，水平也稍有参差。文学媒介的专业水准，和台湾或香港的情况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澳门副刊受香港副刊的影响，版面编排以短文专栏为主体，也就是俗称的“框框文体”。陶里在概说澳门文学时就提到：“报纸散文，字数限在五百至一千之间，超出一千字，编者就较难处理。”^{[3] (P4)}这就导致澳门文学以散文随笔为大宗的现象。为迎合读者口味，走轻薄短小的路线，形成浅碟式的快餐文化，这也是澳门文学的一个特殊性。格局与视野，很难在这些零碎、短小的作品中有大气的展现，取而代之的是轻松说掌故、笑谈生活事的或隽永、或幽默、或讽刺、或抒情的专栏小品。“框框文体”的流行，拉近了与市民读者的距离，推动了文学的广度发展，但同时也局限了文学的深度。黄文辉对此即感到忧虑：“由于澳门文学深深地植根 / 依赖于报纸副刊的扶持，所以报纸副刊既塑造了目前澳门文学的主体风格，又束缚了澳门文学风格往更多元化方向发展。”^{[18] (P53)} 林中英长期在副刊实际从事编务工作，对于“专栏散文”的缺失也有中肯的批评：“专栏可说是双面刃，它能使散文作品因循地生产（其中包括劣质品），它令散文扩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忽略了文学的色彩。要澳门散文创作水平提升，作者们先需克服满足于小方块写作的惯性与惰性。”^[20] 这说明了专栏散文过度的功利适用性，是它的利器，也是它的不足。

当然，澳门“框框散文”的框框，不会束缚所有作家的才华与创意，在“短篇累牍”的文海中，许多作家都是透过专栏写作建立信心、累积经验，并进而在文坛发光发热的。例如1988年，在《澳门日报》副刊《新园地》上策划推出的散文专栏《七星篇》，邀请本地女作家林蕙、沈尚青、林中英、梦子、玉文、懿灵、丁璐、沙蒙等轮流执笔，每篇八百至一千字上下，以女性特有的视角、情怀集体发声，引起瞩目；2000年出版的《美丽街》，是由《澳门日报》副刊《美丽街》大量散文中精选而成，收录林中英、沈尚青、梦子、穆欣欣、胡悦、水月、谷雨、凌之等女作家作品，笔调风格各异，却以丰富的内涵张扬着女性特有艺术个性的生命力。这群女作家在副刊上所构筑的“有情天地”，蔚成一道澳门文学秀丽可观的风景区。

副刊上数量庞大的框框随笔，初步建立了澳门文学的形象与印象，虽说参差不齐，但披沙拣金，还是有不少出色力作，或启发人心、幽默人生，或嬉笑怒骂，文浅意深，题材上描绘澳门风情、讨论澳门事务、

介绍澳门文化、记录澳门人情，加上适度运用澳门粤语词汇和广东语法，使澳门文学的“澳门性”得以生动保留和彰显。例如人称“杂家”的李鹏翥，他的《澳门古今》应是熔知识性、学术性、趣味性于一炉，往往是许多人认识澳门历史文化最先阅读的作品；还有文笔亦庄亦谐、老练辛辣的冬春轩，他的《世说新声》、《鼓柁沧浪》，针砭时弊，大快人心，用词嚼核，令人捧腹，从读书、研讨会、民族谈到洗头、饮茶、冲凉、泊车，特别是融合文言、普通话和广州方言俚语的文字和打油诗，澳门味十足；李公荣《何处宜我居》中的《妈阁庙》、《那一片红树林》、《茶楼》、《当铺》、《街角总关情》等文，回忆澳门今昔沧桑变化，只有老澳门才写得出如此具有怀旧心情的作品。这些短文在副刊专栏刊出时，以其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历史趣味，吸引了不少忠实的读者。

相对于散文的常青，澳门小说发展有比较曲折的历程。周桐在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错爱》，将近十年后，鲁茂才出版长篇《白狼》。鲁茂以三十多年时间写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虽然大多在报刊上发表，但只有一部出版了单行本，小说在澳门的弱势可见一斑。副刊上的小说（特别是长篇连载小说）往往以娱乐消遣为主要诉求，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小说版的报刊都会连载爱情小说及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其中又以武侠小说最受读者欢迎，这是商业文化体系生存及面向读者后的必然结果。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急速发展，曾经风靡无数读者的连载小说开始走下坡，香港报纸甚至在进入21世纪后，几乎找不到长篇连载小说的踪影。《澳门日报》副刊则一直坚持连载小说到2006年底。2007年副刊革新后，小说划入“文化”版，改为每周一次全版，但只刊登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虽然失去报纸副刊的舞台，但并未因此在澳门文坛绝迹，透过出版社及举办中长篇小说征文比赛，在商业娱乐挂帅的环境，《澳门日报》仍坚持着难能可贵的文化理念及文学使命。至于现代诗在1980年代的崛起，陶里直言：“完全有赖于《澳门日报》的支持”，他说：“历届的副刊编辑都不是现代诗人，但他们的文学观是开放的，不排斥任何流派，他们常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五月诗社的专辑。到了90年代，又有一批现代派青年诗人组成了‘如一’诗社，也借《澳门日报》的副刊作阵地发表作品。”^{[3] (P6)}

如此看来，《澳门日报》副刊虽没有撑起整个澳门文坛，但若说它撑起了半个文坛，相信所有熟悉澳门文学生态的人应该都会同意的。在可见的未来，这份报纸的副刊仍将继续引领着澳门文坛风骚，为澳门文学

的深化与推广，尽一份文化人的心力。

四、理解/尊敬：澳门文学的再认识

从殖民到回归，澳门及澳门人都有了新身份和新面貌；回归之后，澳门文学又将以何种身份及面貌走向未来呢？相信这是所有参与和关心澳门文学发展者不能回避的课题。刘登翰写于1999年的一段结语：“就整体而言，澳门文学还在起步之初，缺乏历史积累和社会扶持使其困难重重。但澳门深厚的历史蕴蓄和国际都市的现代色彩，提供给澳门文学的发展的前景，都是可以预期的。”^[21]不能否认，回归十年之后，这段话的某些正确性依然存在。澳门文学早已跨越“起步”阶段的生涩、零碎、贫乏，而有了系列、丰富、独特的成果，但其“困难重重”的局面，则似乎未能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和台湾、香港、中国内地的文学成就相比，确实有着一段不小的差距，但我认为，与其将两岸四地的文学发展置于同一平台来检视比较，不如从各自独特、殊异的面貌出发，正视其自身的艺术特性与文化脉络，以建构众声喧哗的“华文文学博览会”，或许对整体华文文学世界版图的扩大、影响力的提升，会有更具建设性的视野与思考。

历经近三十年“新文学运动”的澳门文坛，已经成功树立其文学形象与主体性格，所谓文化沙漠之说早已不攻而破，甚至于文化码头、文化桥梁的中介地位也不再是其唯一的作用，过去不同的外力曾经使澳门文坛随之倾斜、摇摆，导致面目模糊，发展滞后，但今天的澳门文坛早已是拥有自主面貌与多元特色的丰饶之岛，文化之城。大陆学者杨匡汉说：“当一个地区、一座城市找到自己文化格局的时候，就意味着找到了自身的生命定位和精神品格，也就有了令人尊敬的理由。”^{[22] (P7)}我在2002年为《文讯》杂志策划的“发现澳门文学”专题的论文中也曾提到：“对澳门文学的表现，要不要尊敬是个人的自由，但值不值得尊敬却不是‘自由’可以任意打发的。不论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判断，还是文艺思潮的轨迹追索，文学运动的多元观察，我必须说，时至今日，对澳门文学有意或无意的忽视，都是不公平的，而且可能会是自身文学开展、格局与视界的一种损失。”^{[23] (P35)}以城市定位角度看，香港是一座文明城市，而澳门应该是一座文化城市，和香港比起来，澳门的文化底蕴还是

比较深厚的，这种厚度与深度，给澳门文学的明天增添了很多的可能性。

在新的世纪，特别是澳门文学有了脱胎换骨的表现之后，对澳门文学的再认识，应该是所有关心华文文学者理性的共识。长期推动澳门文学发展的吴志良说：“澳门是一个小地方，却因历史的机缘际遇成就了一个大格局，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而弹丸之地的历史也就令人刮目相看，也就格外迷人，叫人心动，使人神往。”^{[4] (P218)} 小城市大历史，小半岛大格局，如果能走近澳门，进一步认识澳门文学存在与发展的艰困环境，以及澳门作家长期不懈的坚持与努力，那么我们将会重新发现澳门，并对这朵盛开在中国南海边陲小岛上的文学之莲，有另一番理解的包容，尊敬的注目与由衷的赞赏吧。

参考文献

- [1] 庄文永. 八〇年代澳门华文文学概观 [A]. 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C]. 程祥徽, 郑炜明主编.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1998.
- [2] 廖子馨. 文学版为澳门文坛浇花种树 [A]. 我们——澳门日报五十年成长足迹 [M]. 廖子馨主编. 澳门日报出版社, 2008.
- [3] 陶里. 澳门文学丛书概说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 [4] 吴志良. 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 [M].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2006.
- [5] 黄文辉. 不要怕, 我抒情罢了 [M].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2006.
- [6] 刘登翰. 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 [A]. 澳门文学概观 [M]. 刘登翰主编.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8.
- [7] 林中英. 小澳门大澳门 [A]. 自己的屋子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 [8] 懿灵. 后记 [A]. 流动岛——懿灵诗集 [M]. 香港: 诗坊出版, 1990.
- [9] 廖子馨.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 [M].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1994.
- [10] 林中英. 多情城市 [A]. 人生大笑能几回 [M]. 澳门: 星光出版社, 1994.
- [11] 汤梅笑 (笔名林中英). 澳门叙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小说的文化品格与叙事范式 [M].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2004.
- [12] 林玉凤. 协商解决 [A]. 一个人影, 一把声音 [M].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2004.
- [13] 范培松. 澳门女散文家述评 [A]. 千禧澳门文学研讨集 [C].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2002.
- [14] 李鹏翥. 脉脉含情妙手传——《人生大笑能几回》序 [A]. 《濠江文

谭》[M].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1994.

[15] 饶芃子. 眼色朦胧·序 [A]. 眼色朦胧 [M]. 林中英. 香港: 获益出版社, 1996.

[16] 林中英. 交江湖朋友, 做女人文章 [A]. 相思子 [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9.

[17] 李观鼎. 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18] 黄文辉. 胡悦胡阅——兼论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之关系 [A]. 字里行间——澳门文学阅读记 [M].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2005.

[19] 林玉凤, 尹德刚. 澳门文学: 大众传媒·新传媒 [A]. 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C]. 程祥徽, 郑炜明主编. 澳门: 澳门日报出版社, 1998.

[20] 林中英. 托身大众传媒的澳门散文 [N]. 澳门日报·副刊·《镜海》版, 2000-2-16.

[21] 刘登翰. 文化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J]. 文学评论, 1999(6).

[22] 杨匡汉. 澳门人文丛书·总序 [A]. 澳门人文丛书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23] 张堂铨. 边缘发声——澳门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 [J]. 文讯, 2002(5).

(政治大学中文系 台北)

The fertile edge——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Macao and its specific character

Chang Tang-Chi

Abstract: The modern literature in Macao has already been developed for over 30 years since 1980. Modern literature in Macao has undergone a difficult and tortuous journey before changing from desert to oasis, and expressed with its own style. Although long-term being enriched by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lottery gambling” culture, it is regarded as a “lotus”, which is the symbol of Macao to show its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growing up from the filthy mud without being polluted.” Thus, Macao Literature deserved our respect.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cao Literature, it can be summarized into 4 specific characters: the colonial/ immigrant color, outskirts/ trans-passer mentality,

province/ Chinese tradition, commercial/ newsprint character. Since then the aesthetic style of Macao Literature wa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above characters. Henc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Hong Kong and Taiwan literatures.

Key words: Macao Literature; modern literature of Macao; Native Literature; lottery gambling industry; new immigrant